责编：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

◆观 点

如何打破“信访不信法”的怪圈

现实中，一些当事人遇到法律纠纷不走正规的法律程序，而是指望通过信访渠道能遇到领导，通过领导指示来改变命运。而一些领导人又喜欢对涉法涉诉案件进行批示，司法机关又不得不对诉讼终结的案件反反复复地审查，“信访不信法”，领导批示大于法律俨然成了难解的怪圈。

要打破“信访不信法”的怪圈，就必须建立普通信访事件与涉法涉诉案件分流机制。普通信访事件，是由行政机关办理，解决的问题相对并不复杂，或者涉及的法律、法规并不多，程序也相对简单。而涉法涉诉的案件，则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需要由专业的法律人士来办理，也有特定的法律程序，因此，不宜由行政指令来推动。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提出：“立足改变目前经常性集中交办、过分依靠行政推动、通过信访启动法律程序的工作方式，把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由政法机关依法按程序处理，依法纠正执法差错，依法保障合法权益，依法维护公正结论。”因此，修改《信访条例》时，不但应当按照中央精神落实诉访分离的原则，重要的是要制定出可操作的细则，便于信访部门进行分流，也便于信访人理解和接受。

但是，最关键还在于打破领导“批案”的问题。信访人无论有理无理，无论是涉法涉诉还是普通事件，都喜欢上访，就是因为希望遇到“包青天”，从而给司法机关施加压力。如果没有改变领导“批案”的习惯，“信访不信法”的状况不可能改变。据悉，广东省委政法委拟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依法按程序批转，但不得提出倾向性意见。更不能替代政法机关拍板定案。对群众反映诉求的涉法涉诉案件，党政领导干部不得以各种形式干预和插手，各级党委、政法委每年度应当将本级党委领导批案情况和党政部门介入司法情况向本级党委常委会及上一级党委政法委报告。”

但要真正改变领导“批案”的习惯，还须下大力气。一是要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让司法机关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党政领导无法干预案件；二是要建立领导批示公开制度，让领导的批示在案卷中可以看见，接受公众的监督。（2014年3月22日《羊城晚报》杨涛）

“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本质是鼓励创新

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有关“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说法，可看作是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方针的进一步阐释。

改革的本意就是要打破现有的条条框框，既然是打破现有秩序就必然是没有先例。因此就有这样一种说法：“所有的中国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当年，小岗村的那18位农民画押包产到户，不说是冒着丢脑袋的危险，至少也是冒着坐牢的风险。他们的突破开启了农村改革的大幕。

号称“中国第一商贩”的年广久曾三次入狱，其罪名分别为“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他三次被邓小平点名，他雇工制作和销售瓜子的致富行为得到最终肯定。年广久命运的起承转合被认为暗合着中国个私经济的发展进程。

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遇到绿灯快步走，遇到黄灯赶紧走，遇到红灯绕着走”式的灵活变通做法，一度盛行。正是这个无奈却最具效率的策略让广东领一时风气之先。

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现实的问题，这种“打擦边球”思维的惯性和正当性是否还应当延续？无疑，眼下改革已进入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任何改革或发展，都再也不能作为违法的借口。最近中央提出，凡重大改革都要有法律依据。

不断深化的简政放权，要求政府有所管有所不管，这需要政府创新、加强监管模式，变重审批、轻监管为宽准入、严监管，“放”和“管”结合，不是单纯的“放”，也不是一味的“管”。

政府切忌“看得见的手”伸得过长。切忌选择性改革、选择性执法。近来，微信以科技创新的方式不停地撼动着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垄断地位，这一点极具破冰意义。微信已成为中国最具国际化的科技产品之一。可见，只有打破垄断，只有更多的像微信这样物美价廉产品不断出现，才能倒逼垄断部门改变，中国通讯业乃至中国经济才有未来。

当前，互联网金融正面临当初微信同样的境地。余额宝及类似的互联网金融，以高质量的竞争，已经对银行产生了显著的鲶鱼效应。

当然，互联网金融需要被合理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互联网企业都要严格防范支付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必须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放在首位。但应允许给互联网金融企业一个合法的博弈过程，不行还可提交人大协调，修正相关法律，而不能简单到如马云所说，打败你的不是技术，可能只是一份文件。互联网金融是个新生事物，应允许其突破，先行先试，相关法律的跟进与修正则需要发挥人大立法的作用，协调博弈各方以至最终达成共识。

谁都不可以伤害储户支配自己资金的权利。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切忌简单粗暴。警惕以监管的名义扼杀竞争，这是有违“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方针的。

阿里巴巴公司已经给超过六七十万的人做了贷款，却只有两三百个员工在操作，银行万难达到这样的效率。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公司改变了中国，淘宝等网站的最大意义是开始建立起中国人的信用体系。淘宝模式证明中国人讲信用的受褒奖，不讲信用的受惩罚。这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

评判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是能否降低改革成本、提高改革效率。这要求运用好改革辩证法：一方面要让企业创新起来，另一方面又要用“看得见的手”将该管的管起来。比如，金融风险一定要严管起来，而金融创新则必须大力支持。

改革是从“违法”开始的，或者说改革是从法无禁止的边缘区域开始创新的。今天，中央明确一切重大改革需有法律依据。那么，明确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就成为了问题关键。

首先需要完善我国现有法律体系，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最高的法律就是《宪法》，只要不违宪我们都可以探讨。立法权在人大。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特色的法还有“规定”，有些部门的“土规定”是否合法，是否束缚了创新？这是必须拿出来探讨的。

改革者的代价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改革的应有之义本来就包括改掉政府的不合理之手，政府的一些陈旧规定和条例应该大清扫，这也是简政放权的一个直接简便的路径。

当然，“法无禁止皆可为”是保障自由、鼓励创新，但并不意味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要遵守法的基本原则，如不得损害他人利益、诚实守信、公序良俗等，还有需要行业自律、职业自律、道德自律等等。

在生产力各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企业家或有首创精神的人是中国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他们需要得到保护和肯定。

因此，“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本质是催生创新精神，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2014年3月27日《中国新闻周刊》文晔）

改革顺序以何为先

30多年以来，我们的改革战略，一直是先寻求一两个突破口，然后经过若干年实现改革的整体推进，把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就演变成从系统的观点看待改革了。当前有一个提法叫优先顺序，这种观点比起选一两个突破口更具有系统性的考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336项针对各领域的改革项目。那么，在这些改革项目中选择哪些优先呢？根据上一轮改革思路，我认为有借鉴意义的是“最小一揽子改革”。现在需要从330多项改革中选出那些最为重要的和关联性最强的少数改革项目，形成一个“最小的一揽子改革”。这种改革思路，一方面是一种系统的考量，不是单项突破；另一方面又不是面面俱到、分散精力。改革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能选择最重要的且关联性最强的项目优先推进。

从现在到2020年，改革应该划分为若干阶段。对于每个阶段的重点改革内容，对于“最小的一揽子改革”优先项目是什么，现在存在不同观点。比如，一种想法是先易后难，先改难度小、容易改的，以此作为排序标准。另一种观点，目前很主流，是说先改达成共识的，比如说简政放权；暂未达成共识的，后改。有一些改革共识只是原则上的，具体方案有不同意见，就有可能延后了，比如土地产权制度、国企的改革。关于国企改革，目前有一点共识是混合所有制，但具体到混合所有制的内涵是什么以及如何搞混合所有制，意见并不一致。

关于改革的顺序，我的想法是，最好按照让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改革内容作为最优先选项。现在最重要和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提高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这就需要有体制和制度基础，要形成具有一定水平的并且能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作用的改革，应该放在优先地位。如果对这些改革的内容和方案没有达成共识，就需要做工作，尽快达成。如果改革形成的新体制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不能提高经济效率，那么改革最终也会受到挫折。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和改革要求看，在国家部委层面，有两个方面的改革需要优先推进，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改革国有经济。以前，对于政府和市场哪一个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悬而未决，而且过去10年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强，这就成为改革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如果我们要在新一轮改革的初战中尽快取得实效，使大众从改革中得到实际好处，就一定要精心选择和设计这样一些使市场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改革项目，作为改革顺序的优先选项。（2014年3月31日《北京日报》吴敬琏）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

“智库”一词这些年在中国开始流行。据统计，中国智库数量目前已达426家，仅次于美国。全球100家顶级智库中，中国占六席。

但中国智库的生存状态和运行状况如何？据报道，直接为中央决策提供服务，名列世界智库百强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酝酿一次史无前例的内部改革。

智库说白了就是智囊团。它由各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为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是现代领导管理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时被称为“外脑”，就是因为它属于外设机构。

但智囊在中国一开始就与体制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军师、谋士、参谋、门客等都是智囊，都算“体制内人”。“门客”严格地说不算体制内人，但他们由别人供养，也就成为“小体制”内的人了。

到今天，许多智库仍然保留体制的属性，从中央到地方的社科院、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等，都有编制有级别，是“全体制”运行的。

有所不同的是，现在有了民间咨询机构，国外的智库也频频受邀进入中国。上世纪80年代，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采纳了邀请国际著名企业家担任顾问的建议，聘请了“洋顾问”。1999年，广东创办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也开始聘请“洋顾问”。到2011年，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及世界著名科研机构的高层领导人共130多人被聘为省长经济顾问。

显然，如果专家的命运完全掌握在领导人的手里，那么领导听不听专家意见，就要看他们的涵养和心情了。而我们的领导通常要掌声有掌声，要喝彩有喝彩，要学位有学位，要头衔有头衔，很容易被捧为“全才”，或者自视为“全才”。这样能呼风唤雨的领导，往往不容易听从“部下”诸葛亮的计策。

这样的体制环境，让一些专家学者养成了为领导提供决策铺垫和化妆的习惯，所谓的智库就变成领导的“智裤”，最后连自己也出现“智障”了。人们经常称专家为“砖家”，就是因为他们经常说出一些上不接天下不着地的雷人雷语。

这次对智库的改革动力，据称是来自国外智库的挑战。但国内的一些智库不能提供真正的智力服务，逼使人们纷纷聘请“外脑”，钱被别人赚了还是小事，而智库出现“智障”、向决策者提供“馊主意”才是大事。“外脑”之所以能起到真正的智囊作用，恰恰因为它能够独立思考，不需要看领导的脸色“献计”。

养“门客”与请智库都需要花钱，但花钱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在这一点上人家就比我们聪明，于是他们才会有兰德公司这样的著名智库。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智库只能是“外脑”。美国钢铁公司创始人卡内基说过：“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资金全部夺去，只要留下我的成员，4年后我仍将是一个钢铁大王。”卡内基去世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镌刻道：“这里安葬着一个人，他最擅长的能力是把那些强过自己的人组织到他管理的机构中。”（2014年4月1日《中国网》何龙）

◆纵 横

习近平欧洲演讲传递出的信息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法、德等国访问中，就中国的发展、外交政策等多个问题多次发表演讲，并且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媒体上撰文，就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阐述看法。其中他谈到的“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等观点，引发了国际媒体的热议。

总体上说，习近平的多次演讲，展示了目前中国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总体战略思想，也回应了此前在国际舆论中对于中国的一些疑问。尤其是对欧洲主要国家来说，近距离与习近平的密切互动，使得欧洲政治家有机会寻找一些重要问题的答案。

首先，欧洲会在中国外交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当说，就国际社会的观感来看，自十八大和去年两会以来，中国领导人的访问主要围绕发展中国家展开，足迹遍及非洲、亚洲、东欧、拉美。当然，习近平也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洲领导人在多个场合会晤过。但是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洲曾经有声音认为，在未来中国的外交版图中，欧洲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此次习近平在荷兰、法、德、比利时欧盟总部的访问中，实际上显示了欧洲仍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中国十分重要。尤其是荷兰、法、德等国家，在中欧关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法国的文化、德国的工业、欧洲区域经济的分工合作，都值得中国进一步学习，这些也成为未来中国的增长点所在。

其次，中国会不会改变一贯的外交理念。这两年来，随着中国周边地区局势的不断变化，海外出现一种声音，认为中国会改变以往“韬光养晦”的外交理念，逐渐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强势国家，在一些热点敏感问题上主动出击。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大了目前中国周边出现的一些担忧，同时对中国的发展带有巨大的疑虑甚至是猜疑。因此，对于中国的发展，既要认识到其客观性，就像习近平所说，狮子已经醒来，又要考虑到中国发展不称霸、不走国强必霸的承诺。中国的外交理念，既有战略层面的需要，又有文化传统和世界观哲学因素。习近平的几次演讲，其实是在重新诠释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致性。

再次，如何在未来一段时间，与一个正在快速变化的中国打交道。从习近平的几次演讲来看，他都谈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在改革领域的全面深化，也谈到中国和欧洲的共同发展，这同样也向世界传递一个重要理念，中国的机会仍然存在，欧洲乃至世界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可以扮演一个共同发展者，或者利益攸关方的角色。

因此，欧洲要更加接近中国，就要在这些问题中找到答案。中国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就不仅只是GDP的数值增长，而且是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和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欧洲占据工业革命之先机，在这些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中欧的共同发展中可以相互借鉴。而中国作为新兴市场，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外交、不同的战略需要，也会选择自己独特的道路和发展方向，这也是欧洲要从习近平的几次讲话中发现和理解的。（2014年3月31日《光明网》商汉）

◆评 论

别让文件打败创新

2013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以余额宝、二维码支付为代表的新型金融产品横空出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写了中国的金融格局。这些创新型产品，给公众创造了“坐在家里把钱赚了”的机会，也为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金融业与互联网的结合，被视为新形势下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亮点。但正当企业和公众都期待创新能带来更多红利时，有些旨在防控风险的文件出现了。

不可否认，诸如互联网金融之类的创新产品，和所有新生事物一样，在发展的初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漏洞和缺陷，也蕴含着一些不确定风险。但是，新生事物的发展本来就是个“试错”的过程，只有大胆地容忍它们犯错，才能从中汲取教训，进而更好地促进事物的发展。如果仅仅因为可能出现错误和风险，就粗暴地将创新扼杀在摇篮里，最终结果是消灭了风险也消灭了创新。

最新消息称，面对质疑，央行表示《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草案短期内不会发布实施，此前被叫停的虚拟信用卡和二维码支付，也将在第三方认证安全后放行。给创新放一条生路，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这件事对相关职能部门来说也是一种教训，在制定文件之前，只有充分征求民意和经过科学论证，才能实现决策科学化，也才能实现政令畅通。（2014年3月22日《京华时报》刘璧洁）

警惕“限购＋限行”副作用巨大

杭州汽车限购令“夜半鸡叫”在业界引发很大震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杭州，越来越多的城市进行限购，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地方城市汽车限购的步伐了。

然而，限购这种行政治堵、治污手段副作用巨大。一旦像传染病一样在一线、二线城市蔓延，对汽车产业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其高昂的社会管理成本、对市场经济供需关系的扭曲将使限购得不偿失。

分析各地目前采用的治堵、治污手段，对机动车“限购＋限行”成了标配的处方药。然而这种行政调控手段首先会破坏市场经济商品自由流通的属性。汽车作为一种商品，买卖之间本不需要额外的行政许可审批，然而打着治堵、治污旗号平白诞生的指标、配额成为居民正常消费的拦路虎。

为了限购落实执行，凡是限购汽车的城市又要附加对外地牌照汽车限行，这种管理思路蔓延下去，恐怕会限出挂中国各地车牌的汽车工作日高峰时段不能“串门”的咄咄怪事。

以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突破口交通一体化来说，作为先行领域本应尽快互联互通，然而目前北京、天津“限购＋限行”的手段导致“京”字头牌照的汽车工作日高峰时段进不了天津城区；“津”字头牌照的汽车工作日高峰时段进不了北京城区；“冀”字头牌照的汽车工作日高峰时段更进不了北京和天津城区。表面看只是汽车难以“串门”，背后隐藏的物流成本高得惊人，成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拦路虎。

欧盟申根国的汽车都可以在巴黎、柏林之间一路畅通，中国一个直辖市的汽车却不能“合法”地在工作日高峰时段进入仅仅相隔100多公里的另外一个直辖市的城区，这种落后的行政管理手段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典型的只管自己的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对物流、人流造成的“障碍成本”有多高不言自明。

从汽车社会与汽车产业对接的层面分析，“限购＋限行”这种处方药对产业的打击和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简单地用一刀切的行政手段限行、限购，会对市场上中低端的自主品牌形成致命打击，会使限购城市的汽车流通产业元气大伤，会对市场经济原本的发展节奏造成严重干扰。最终，国家汽车产业政策和地方汽车社会管理手段成了分裂的两张皮。

笔者认为，越来越多的大城市采用“限购＋限行”手段，必须尽快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应当尽快完善顶层设计，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明确，“限购＋限行”能不能被地方任意采用？如果真到了必须采用的时候，其临界指标又是多少？其程序正义又应当是怎样的？（2014年3月31日《新京报》南辰）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